第一章

其人其书其事

赵人公孙龙——『子秉』非公孙龙字——

《公孙龙子》非伪托之作——《公孙龙子》传世源流——名辩者生涯

客问 司马迁《史记》中出现两个公孙龙。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都说两者是一个人，并且指的就是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答问 这是一个大误会，谬种流传，甚至到 20 世纪还有人信。其实，太史公本来说得很明白：“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请注意“而”“亦”两字。审语意，即可明白世有两个公孙龙，更不用说，子石是孔子弟子，而我，也就是“为坚白同异之辩”的“公孙龙”，同孔子六世孙孔穿同时代，上距孔子卒年几近二百年。这本来一清二楚，无隐可索，也无疑义可正。偏有好事者如司马贞、张守节，平白生出一桩公案。以讹传讹，及至康有为还在孔子“七十弟子”中特别提到“公孙龙传坚白”(《论语注序》)。他说我的学说传自孔子，更是匪夷所思。实际上，即如“坚白”之说，庄子说起于杨朱、墨翟时代(《庄子·骈拇》)，但这并不确实，还是现代的郭湛波说得对：“‘坚白同异’之辩，是惠施时代的辩题。”(《先秦辩学史》)不过，讹传止于智者。宋代王应麟就已根据我曾是平原君赵胜门客的身世，判明司马贞之非(《汉书艺文志考证》)。清代俞樾更说得透彻，孔子弟子之公孙龙决不可能同孔子六世孙孔穿辩论(《庄子人名考》)。

客问：《史记》记先生为赵国人。可是，怎么汉代高诱说您是魏国人(《吕氏春秋训解》)呢？

答问：这也事关“验明正身”,有必要申明一番。我是赵国人,这已见诸众多典籍(《史记》、《汉书·艺文志》、东汉许慎《淮南鸿烈间诂》、《列子·仲尼》、西晋司马彪《庄子注》、唐代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高诱说我是魏国人,也是事出有因。我早年去过魏国，与公子牟相善交游（《庄子·秋水》),还同魏王论学(《列子·仲尼》)。可能因为这个缘故，高诱误以为我是魏国人。不过，诚如谭戒甫细心察知，事有蹊跷。高诱注我为‘魏人’,载于《应言》篇,而以前诸篇也屡屡谈到我，他却未就我的籍贯着一字。所以，谭戒甫言之有理：“似非原本如此。或浅人以《应言》前段系言魏事。”(《公孙龙子形名发微》)除了误我为魏国人,还有人说我是周国、齐国人(清代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惟此说信者寥寥，因为‘此明人臆说,不足置辨’(胡道静：《公孙龙子考》)。这里我还想说说孔子弟子公孙龙的籍贯，因为有时人们把他的籍贯误认为是我的。东汉郑玄说，他是楚国人（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张守节据《孔子家语》说他是卫国人(《史记正义》)。他在后世还得到追封,唐代封为‘黄伯’,宋代封为‘枝江侯’,。

客问 唐代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和殷敬顺(《列子释文》）说先生表字子秉。这又引起后世聚讼不止。您能不能澄清一下？

答问：可以。这还非常有必要，因为这里牵涉到我活动的时代，远不止是姓甚名谁的问题。首先，我要郑重声

明,我并没有这个字。然而,成玄英、殷敬顺的‘字子秉’说影响既广且远,直至 1989 年出版的《中国逻辑史·先秦卷》(李匡武主编)还在说我‘复姓公孙,名龙,字子秉’。成、殷之说所本,是《庄子·徐无鬼》中所说“:庄子谓惠子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成玄英注释说“:秉者,公孙龙字也。”殷氏可能直接采取成说。宋代王应麟又重申唐人旧说,并其所持之故(《汉书艺文志考证》、《困学纪闻》)。从此之后,假几乎成真。不少现代学者都相信这种说法,如王琯(《公孙龙子悬解》)、胡道静(《公孙龙子考》)、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要明白子秉并非我的字,关键在于了解我的生卒年和活动年代。这方面,现代学者钱穆在其名著《先秦诸子系年》中作了最详尽而又确凿的考证,尤其把我的年代同惠施、庄周联系起来,直接驳斥了‘公孙龙字子秉’说。因此,我把他的话录引在这里“:燕昭以二十八年破齐,至三十三年卒。龙之说燕昭在二十八年后,是为龙事迹最先可考之年。又下至平原君卒,凡三十三年。此下无公孙龙事。龙卒盖亦在是时。则其生当在燕哙齐宣时,惠施已老。施之死在魏襄王九年前,龙盖未能逾十龄也。龙寿当在六十七十间。相传庄周却楚威王聘,威王卒岁,周年最少亦三十,多至四十。下逮惠施之卒,周年五十至六十。时公孙龙不出十岁。’”他推定,我的生卒年为公元前 320—前 250 年,惠施的生卒年大约为公元前 369—前 309 年。现在可以来指认‘字子秉’说之非了。惠施死时,我还在童年,庄子决不可能当他面把我与他相提并论。所以,胡适也说“:公孙龙决不能和惠施辩论。”(《中国哲学史大纲》)更重要的是,名辩之学到了我的时候才蔚为大潮,达于极盛。在惠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才是显学,惠施作为名辩者在诸子百

家中并无重要地位,尤其为庄子所不屑。他认为,惠施之学只是雕虫小技,却自以为是。他说:"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庄子·天下》)所以说,即使没有年代的问题,庄子也不会把我单列一家,与四家并驾齐驱,何况我与惠施原属一家。"公孙龙字子秉"说之谬,于此自明。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始作俑者成玄英自己的立论来辨其说之伪。今人伍非百可谓慧眼独具,其言正中肯綮。成玄英是在阐释《庄子》时作出伪说的。伍非百首先指出,他立论多失据不当。伍氏写道:"成玄英疏:'儒,姓郑名缓。墨,名翟。杨,名朱。秉者,公孙龙字。增惠施为五。'后人因之,遂造为'公孙龙字子秉'之说,且据之以断施龙同时。不可不辨。考玄英为贞观时道士,其所作庄子疏,颇有名。唯于古人名字姓氏,多臆造,或出真诰之类。如云庄子字子休,是其一例。此篇疏举儒墨杨秉四人,尤拉杂可笑。原疏云'墨名翟,杨名朱',何不云'儒者孔丘'耶 既于杨墨各举所宗者矣,而于儒独不然,岂非以其时代不相近耶 惠施相梁,孟子以斯时来游梁。孟,大儒也,且好辩,尤好与杨墨辩,则斯时与杨墨惠辩者,宜莫如孟子矣。何不曰'儒者孟轲'耶 今于儒家所宗,既不肯远溯孔子、辩者时代,又不复近言孟轲,而独举一乡曲詹詹小辩之郑缓,以当儒者大师之论坛,其义何居 盖玄英所见书,不出道家言,而穿凿附会又过之。故其云'郑缓、墨翟、公孙子秉',皆出庄子,而误解其文义,遂成缪妄。考《庄子·列御寇》:'郑人缓也,呻吟裘

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与辩,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因‘郑人缓也’,遂造为姓郑名缓。因‘其父助翟’,遂谓其弟名翟。以兄弟之争,当儒墨之辩。因儒而及缓,因缓而及翟,因翟而及杨朱,极牵帅无俚。且所谓翟者,郑翟耶,宋翟耶?妙语双关,非疏证家核实者所宜有。”(《中国古名家言》)然后,他又令人信服地指出,成氏以这种臆测的态度误读《庄子》,引出我字秉的结论。伍氏说:“‘秉者,公孙龙字’亦缘误解《庄子·天下》文义而云然。《天下》谓‘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意,易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夫惠施日以其知与人辩,其辩不必为公孙龙。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意,易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其人又不必为惠施。不过言两派学说先后辈相訾相应,未尝云及身而亲辩之也。玄英误解其义,以为施龙本人曾相与辩,则此秉者,唯与惠施对辩之公孙龙足以当之,遂臆造为‘秉者,公孙龙字’。缓无姓而有姓,弟无名而有名,龙无字而有字,皆羌无故实,不足据。”(同上)

那么“秉”指什么人呢?我以为,明代王船山说“秉为法家”(《庄子解》),最为允当。只有法家能够在五席中位居其一。可惜,王船山的这一卓见现代学者没有注意到。当然,我也不排斥异说。伍非百就提出“秉”指季真。据钱穆考辨,季真是齐国人,属稷下黄老道家。伍氏说他与惠施同时代(据钱穆,生卒年为前 360—前 290 年),也好论辩,关心的问题亦与惠施相同。此外“季”“秉”两字形似,易误同。所以,伍氏说:“必季而非秉也。”(《中国古名家言》)清代洪颐煊认为“秉疑宋误”(《读书丛录》),即“秉”指宋钘。宋钘

也是齐国稷下先生,其时代同惠施(据钱穆,生卒年亦为前360—前290年)。值得注意,季真和宋钘同属稷下学派。当时正是齐宣王时代,而稷下学宫在宣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当时列国的学术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白溪:《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如此看来,“秉”也很有可能指季真或者宋钘。

不过,说到表字,我倒是有的,即子石,与孔子弟子公孙龙(人称“前公孙龙”)同字。关于这一点,谭戒甫言之有理:“《盐铁论》第三十一,丞相史引有公孙龙语。王启原注:‘按孔子弟子公孙龙,字子石。七国时著书者又一人。据下所言,则平原君之客,非圣门弟子也。后又举其字为子石(按后文贤良答,有‘此子石所以叹息也’之言),则二人俱字子石。龙,当读如磨。’此名字相应,似得其实。”(《公孙龙子形名发微》)

客问:今人伍非百经考证得出结论说,今本《公孙龙子》不能肯定是先生所作,也有可能是前公孙龙所作。他的原话是:“今所传《公孙龙子》之书,为前公孙龙作,或为后公孙龙作,均有可能。但均已不可考。西汉以前之史料,不言谁作(大抵谓子石)。西汉以后之史料,则谓六国时辩士,平原君之客公孙龙作(其说始见于桓谭,谭之言不足征信)。”(《中国古名家言》)对此,不知先生想说些什么?

答问:近代和现代学者开始对我的书发生浓厚兴趣。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至于对我是今本《公孙龙子》的作者这个史实提出疑问,我以为真理越辩越明。说句笑话,我原本就以善辩名世。更何况我作为《公孙龙子》作者这个事实今天也还是公认的。伍非百对我的研究在现代学

林是有口皆碑的。不过，不知他怎么会口出此言。大概凡事都留下一点遗憾吧。其实《史记》里的话可以为我作证。桓谭出生前五十多年才去世的司马迁说：“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 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 楚有尸子、长卢 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清楚地说明，我在西汉时有书广为流传，而且是关于坚白同异之辩的。再来看，司马迁在给前公孙龙作传时，只说他比孔子小五十三岁，以及有书记载他的年龄、姓名和曾受业于孔子事,仅此而已。而读过《史记》的人知道,传主有著作时，太史公是不忘郑重记上一笔的。其实，桓谭并没有明言我作《公孙龙子》。倒是比他大五十多岁的刘向明确提到“《公孙龙子》十四篇。公孙龙乘白马以度关。”(《别录》，《初学记》引)这是说我作了《公孙龙子》共十四篇。总之，古本《公孙龙子》的确是拙著。

客问：虽然可以肯定古本《公孙龙子》是先生的大作，然而，我们读到的是传世至今的《公孙龙子》。有人怀疑今本《公孙龙子》不是先生的原作，而是后人伪托之作。最有名的是清代姚际恒的质疑。他说：《公孙龙子》“《汉志》所载,而《隋志》无之,其为后人伪作奚疑？”(《古今伪书考》)今本《公孙龙子》究竟是不是古本的遗存？请先生赐教。

答问：首先，回答是肯定的。姚氏的起疑，只是缘于《公孙龙子》未见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这个“孤证”是站不住脚的。我的著作在《隋书·经籍志》中究竟有无著录,姑且存而不论。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无著录，也不能就因此而

断言,我的《公孙龙子》在当时已亡佚。王琯说得好:"世乱兵燹,典册播荡,即有晦显之遭,宁为真伪之界。"(《公孙龙子悬解》)是呀,即便在太平盛世,修志者也未必做到对典籍搜罗无遗。近人李笠更以事实来说明典籍的这种"晦显之遭"。他说:"古书有晦于前代,而现于后人者,即如敦煌石室书,岂宋明人所及见耶?私家秘籍偶然发现,亦不能概以伪书屏之也。即如《内经·太素》载于《隋志》而不见于后来书目,袁昶偶然获于异域,岂可言其作伪哉?史臣亦只就官有者而著录之;其散入民间者,未必如近代之旁搜博访也;故往往晦于一时耳。"(《国学用书撰要》)也是无巧不成书。宋代《文苑英华》载有《拟公孙龙子论序》,它证明我的《公孙龙子》在《隋书·经籍志》成书时代尚存在于天壤之间。该文作者为佚名唐人,他记述说,他对公孙龙"尝闻其论,愿观其书。咸亨二年……自嵩山游于汝阳,有宗人王先生,名师政,字元直,春秋将七十,博闻多艺,安时乐道,恬淡浮沉,罕有知者。扑过憩焉,纵言及于指马,因出其书以示仆,凡六篇,勒成一卷。"(《文苑英华·杂论上》)我们知道,《隋书》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 656 年),与王某获观王师政所藏我的《公孙龙子》的年代略同而稍前。不难想见,当时正是离乱之后,官藏典籍多有散失,致流入民间。《公孙龙子》既为隐逸之士保有,史官不得见原属正常。事实上,诚如王琯所考证,《公孙龙子》存世的踪迹一直到梁朝,代有学者记述。王琯写道:"《汉志》《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扬子《法言》称龙诡辞数万,似当时完本,为字甚富。《三国志·邓艾传》注引荀绰《冀州记》,谓爱俞辩于论义,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晋张湛《列子注》亦引原书《白马论》,称此论现存云云。刘孝标《广绝交论》曰'纵碧鸡之雄辩','碧鸡'

一义,即出本书,可证魏梁之间原著犹存。”(《公孙龙子悬解》)上述王师政藏《公孙龙子》的年代去梁代只不过百年。在《公孙龙子》千多年的流传史上,这是个不长的时间。

另外,作为考证,除了考据之外,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还应当从义理即内容来认同古本和今本《公孙龙子》。杜国庠根据刘向《别录》(《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记载邹衍述评我的学说的话,指出今本《公孙龙子》确系真本(《论〈公孙龙子〉》)。邹衍批评我说“:繁文以相假,饰辞以相谆,巧譬以相移”,唯求“辞至”。这从反面点明了我的学说的要义和意旨,而这批评完全可以移用于今本《公孙龙子》,丝丝入扣。金受申也从内容上论证今本《公孙龙子》不是伪作。他说得很对“:《公孙龙子》自《白马论》以下五篇,论理一贯,文辞僻违,决非后人所能伪作。”(《公孙龙子释》)

客问 先生刚才说到“我的著作在《隋志》中究竟有无著录,姑且存而不论”,这好像是说,您的《公孙龙子》在《隋志》中实际上是有著录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现代许多人(汪馥炎、栾调甫、孙碌、伍非百、谭戒甫)认为《隋志》在“道家”名下著录的《守白论》是《公孙龙子》的异名,是对的呢?

答问 是对的。《公孙龙子》曾有异名《守白论》,也就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守白论》。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主要疑虑在于《汉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把我的著作著录于“名家”名下,且俱名《公孙龙子》。为何介于它们之间的《隋志》却以《守白论》之名录于“道家”名下呢?王琯集中表达了这种疑问“:《隋志》《守白论》不载作者姓名,是否公孙所著,或为他人述作而书名

偶同,均不可考。公孙原本名家,《隋志》《守白论》列在道家。名道两宗，根本抵触；绳以原书论旨，亦无拦入道家余地。据此,或《守白论》另为其他之道者所著,亦未可定。”(《公孙龙子悬解》)然而,《公孙龙子》的异名《守白论》的形成正是与道家密切相关，所以，异名和列入道家名下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按照你们今天学术分类的静态准则，是无法理解这种现象的。因此，必须把它放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我的《公孙龙子》集名家之大成，先秦百家争鸣时代也曾风光一时，但随着儒家成为主流和正统，它也就逐渐被冷落。然而，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弘扬道家思想的玄学兴起，清谈名理成风。卷入这股思潮的学者垂青我的学说，因为合他们的胃口，于是，我的书又备受注目。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的书被认为与“道家”密切相关。我以为,影响《隋志》用《守白论》这个异名著录我的书的最重要因素或者说背景，当推唐初道家成玄英最早明确说我的书名为《守白论》。他说“:白,即公孙龙《守白论》也。姓公孙,名龙,赵人。”(《南华真经注疏·齐物论疏》)“公孙龙秉性聪明,率才宏辩。著《守白》之论,以博辩知名。”(《南华真经注疏·秋水篇疏》)“公孙著《守白论》,见行于世。”(《南华真经注疏·天下篇疏》)“坚白,公孙龙《守白论》也。”(《南华真经注疏·天地篇疏》)这是最确凿的证据,说明唐初《公孙龙子》已易名《守白论》。

我的书成于诸子百家时代,作为‘子书’,被命名为《公孙龙子》，是当然之事。可是，到了久被淡忘后重又显于世之时，已是时过境迁。人们看重我的书，不再着眼于它是一部‘子书’,而是关注它的内容。《守白论》这个异名即种因

于此。谭戒甫详细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他言之有理。他说 桓谭‘言龙为《守白之论》,亦非谓龙全书名《守白论》也 而玄英乃始确称龙著《守白论》。谭为汉光武时人 玄英为唐太宗时人。然则此六百年中,《守白论》之成为书名,究起何时乎？尝考龙之学原以《白马论》为最著，而其书编次亦以《白马论》居首,文最易知。后之读者开卷即味其文,辄惊为新异而钻研之，而谈论者纷起矣。夫桓谭之说，本因《白马论》而发。或东晋以后(张湛之后)之好事者视谭说为弘通,乃抄录《新论》此文以列于龙书《白马论》之前,因中有‘为《守白之论》’句,适中当时谈玄之风,遂目龙之全书为《守白论》。”(《公孙龙子形名发微》)

我的著作易名为《守白论》,究竟始于什么年代呢 谭戒甫推定约在晋宋间。伍非百则考定，至晚在梁代，因为“《隋志》承阮孝绪《七略》而来,凡《七略》有而隋无者,皆注今亡。名家下,既不注‘梁有《公孙龙子》,今亡’,而道家增‘《守白论》一卷’,则改易者当自梁已然”(《中国古名家言》)。最早则在“人晋之后”,因为“观《隋志》道家次序,《守白论》一卷，列于魏河东太守任瑕与吴唐谤之前。唐谤生于吴太元二年,书成在人晋之后(见《玉函山房辑佚序》),则正俞世都采集公孙龙学说之时也。”(同上)总之,晋宋梁间,我的《公孙龙子》开始有了异名《守白论》。

从晋宋梁到唐初的百多年里,我的书在道家那里以《守白论》名盛传,官修《隋志》成书乃在唐朝前期,把《守白论》著录于“道家”名下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前面已说到,在这期间，我的书也至少在民间仍以《公孙龙子》原名同时并行存世。

客问 听了先生刚才一番持故之论,根据《隋志》无著录而断言今本《公孙龙子》是伪托之作，这个疑团也就冰释了。不过，今人沈有鼎怀疑汉代尚行世的古本《公孙龙子》今已不复存在,今本《公孙龙子》“ 可能是晋代人根据一些破烂材料编纂起来的 ”(《〈公孙龙子〉的评价问题》),至多除了《白马论》一篇及《通变论》开头一段 二无一 ”也许是残存的以外，其他诸篇都是 “ 晋代学者根据破烂的写本或片字只语加盐加酱勉强串起来的 ”(《谈公孙龙》)。先生已认定今本《公孙龙子》非伪托之作，想必要驳斥沈氏的说法。很想听听先生的雄辩。

答问：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让历史的事实来说话吧。沈氏声称今本《公孙龙子》与汉代流传的古本面貌完全不同，而他的前提却又是后者今已不存。那么，既然如此，其面貌又何以见得？我看，他的臆测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 战国时期以后，在晋代出现了逻辑思想的又一高潮。晋代的 ‘ 名家 ’ 除讨论才性问题外，也讨论逻辑问题 ”。因此，“ 不要认为晋代人是没有能力来发挥战国末期的公孙龙的一部分思想的 ”(《谈公孙龙》)。这就关乎思想史的事实了。所以我说要让事实来说话。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思想史的玄学时代。思想家论玄谈虚，摒弃伦理说教。这种风气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重视论辩,讲究名辞,崇尚清谈即‘ 名理 ”。这就为我的学说在长久沉寂之后又为人们注目准备了土壤和气候。汪奠基就指出了这一点“：魏、晋、南北朝时代,士大夫好谈名理,喜欢讲《白马论》的人很多。《世说新语·文学篇》说：‘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 ’ 。又记乐广亦喜清谈 ‘ 指不至 ’ 的虚玄。刘孝标注引《魏志》 尚书傅嘏论 ‘ 同 ’ ,中书令李丰论

‘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可见晋人虽崇尚华辞，而亦有弄名家语言者。《唐志·道家》张游朝著《冲虚白马非马证》八卷,可能是汇集了当时很多《白马论》的文章编成的。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谓‘公孙之白马孤犊,辞巧理拙,魏牟比之鸮鸟,非妄贬也’。(《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 1 辑)魏晋玄学孕育了晋代的逻辑思潮,其标志是鲁胜的《墨辩注》和《刑名》。可惜,他的著作已亡佚,你们今天只能在《晋书·隐逸传》中读到《墨辩注序》。

我谈晋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兴微继绝的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今本《公孙龙子》并非晋人所作。这包括两个方面:不为’和‘不能为”。先来说前一方面。前面说到,我的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合人们胃口而获青睐。其实这仅仅限于刚才说的引起人们兴趣，得到一定重视。而且，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赞成我的学说本身。相反，魏晋玄学的根本关怀是宇宙和人生的形而上学,因此,我的‘雕虫小技’只会被他们鄙视。刚才引的刘勰的话便是明证。再如，郭象指斥我的学说‘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庄子·天下篇注》)。其实,玄学以庄子为魂,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鲁胜:《墨辩注序》)。我的学说同玄学大异其趣。既然如此，晋代人怎么会有兴趣、意愿去花功夫杜撰我的书呢？杨芾荪就见及于此，撰文反驳沈有鼎的论点（《公孙龙子非伪作辨》)。

其次,即令晋人有此雅意,也没有能力伪作我的书。连鲁胜也感叹:‘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墨辩注序》)。他注《墨辩》,作《刑名》,也只是‘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同上)。值得指出,沈氏还说，以鲁胜为最高代表的晋代逻辑水平并没有达到《墨辩》所代

表的先秦逻辑水平,而今本《公孙龙子》只是代表了晋代逻辑水平。他这样说，只能说明他没有真正把握住《公孙龙子》的精髓。其实,我的《公孙龙子》提出了一种语言分析哲学理论,就其逻辑理论意义而言,同《墨辩》提出的作为推理原理的逻辑本身相比，又是一种更一般但更深刻的逻辑理论。因此,我的书比《墨辩》更“难知”,更难“传习”,更不用说要拟作我的书了。

客问 现在可以肯定,今本《公孙龙子》并非伪托之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南宋郑樵说:《公孙龙子》“旧十四篇,今亡八篇”(《通志·艺文略》)。陈振孙也说“:《汉书·艺文志》十四篇,今书六篇。”(《直斋书录解题》)今人庞朴力言,《公孙龙子》原来就只有今存的六篇。他的论据为,由“六”到“十四”,乃年代久远,辗转传抄发生笔误所致,更重要的是“;六篇之外无余义”(《公孙龙子研究》)。不知先生的《公孙龙子》原来究竟有多少篇？

答问 庞朴的质疑的确很有意思。其实,他认为,今本《公孙龙子》非“残真”而系“全真”,如他自己所说,乃本于今人黄云眉的观点。黄氏说：“今书由十四篇减为六篇，而第一篇……明为后人所加之传略，则六篇只得五篇矣。第七以下皆亡。第二至第六五篇，每篇就题申绎，累变不穷，无愧博辩，然公孙龙之重要学说，几尽括于五篇之中，则第七以下等篇又何言耶？虽据诸书所记，五篇之外，不无未宣之余义，然又安能铺陈至八九篇之多耶？以此之故，吾终疑为后人研究名学者附会庄、列、墨子之书而成，非公孙龙之原书矣!”(《古今伪书考补证》)显然,庞朴从“六篇之外无余义”出发,以此先人之见去否定《汉志》之著录。实际上,无

独有偶,刘向《别录》也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初学记》卷七引)。刘向校阅群书而成最早的目录学专著《别录》。它与《史记》不过相去几十年,正是补了后者的缺。《汉书·艺文志》更不仅是最全的古书目录,而且同时记叙古代学术、学科和学派的源流。所以说,我的著作曾被编成十四篇,是不容随便怀疑的。当然,篇目要完全确定,还有待于新的考古或其他发现。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学说几乎完全为那六篇所穷尽。除此之外,我也另有著述,这就是后人所谓‘诡辞数万’(扬雄《法言》)。自然‘数万’不是实数,只是极言其多。扬雄和刘向同时代,早于班固,是见过十四篇的。其内容包括见诸《庄子·天下》的‘二十一事’,《列子·仲尼》的‘七说’和刘向《邓析书校叙》的‘无厚’论。不过,相对于那六篇来说,余八篇的内容可以说皆属旁枝侧叶。庞朴说得对,八篇的佚失并非晚至南宋,唐人王师政已只见六篇。至于八篇究竟亡于何时,怎么会亡,因为是我身后之事,所以,我与你们一样,也只能推测。我以为,其时不早于《公孙龙子》易名为或说取异名为《守白论》之际,即前面考定的晋宋梁间。而且,可以大胆设想,这易名正同八篇亡佚密切相关。剩下的六篇是《公孙龙子》的主干,全围绕‘守白之论’或‘白马之论’展开。因此,这些残篇被易名为《守白论》。甚至还可以更大胆地“妄加揣测”,晋宋梁间人把十四篇中的六篇编定为《守白论》行世,余八篇随全本《公孙龙子》逐渐亡佚,至唐初人已不复得见。又至晚在后晋人作《旧唐书·经籍志》时,《守白论》恢复《公孙龙子》原名。当然,民间更早时如王师政者仍呼以《守白论》旧名。总之,可以想见,围绕我的著作的几桩公案的背后有着这种内在联系,把握住了它,也就不

难索解了。

现在可以明白,今存《公孙龙子》是残真本。

客问 刚才所引黄云眉的话提到,今本《公孙龙子》六篇中第一篇《迹府》是后人补加的，真正属于先生原著的只有五篇。这是怎么回事？

答问:《迹府》略记我生前事迹,的确不是我自己所作。黄氏的观点代表了你们当代学者的一致看法。不过，围绕这篇著作究竟是我身后哪个时代由谁人所作，他们还是有不小分歧。影响较大的是王琯和谭戒甫的看法。他们认为,《迹府》“ 原文非龙自著,似由后人割裂群书,荟萃而成 ”(《公孙龙子悬解》);“ 文只二段(《道藏》本不分段)前段为后汉桓谭所作 后段核由《孔丛子》抄袭而成,或唐人所增。”(《公孙龙子形名发微》)

不过,我倾向于赞同杨俊光的卓见,他认为,是我的弟子在我死后编定《公孙龙子》时所撰;“ 其年代,当在《吕览》成书前后,即秦统一六国前夕 ”(《公孙龙子蠡测》)。他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首先,他考定,不是《迹府》首段抄自桓谭《新论》,而是恰恰相反。《迹府》首段同《太平御览》辑佚的桓谭《新论》相比,前者比后者多出这样一些话“: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以守白辩……夫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今合以为物，非也。为求白马于厩中，无有；而有骊色之马，然不可以应有白马也。不可以应有白马，则所求之马亡矣，亡则白马竟非马。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桓谭对我取贬斥态度,而且作为经学家，也不可能写出这样‘ 专业 ’的话。其实,《迹府》作者完全可以不假外求，直接根据其余五篇即可写成此段文字。相反，